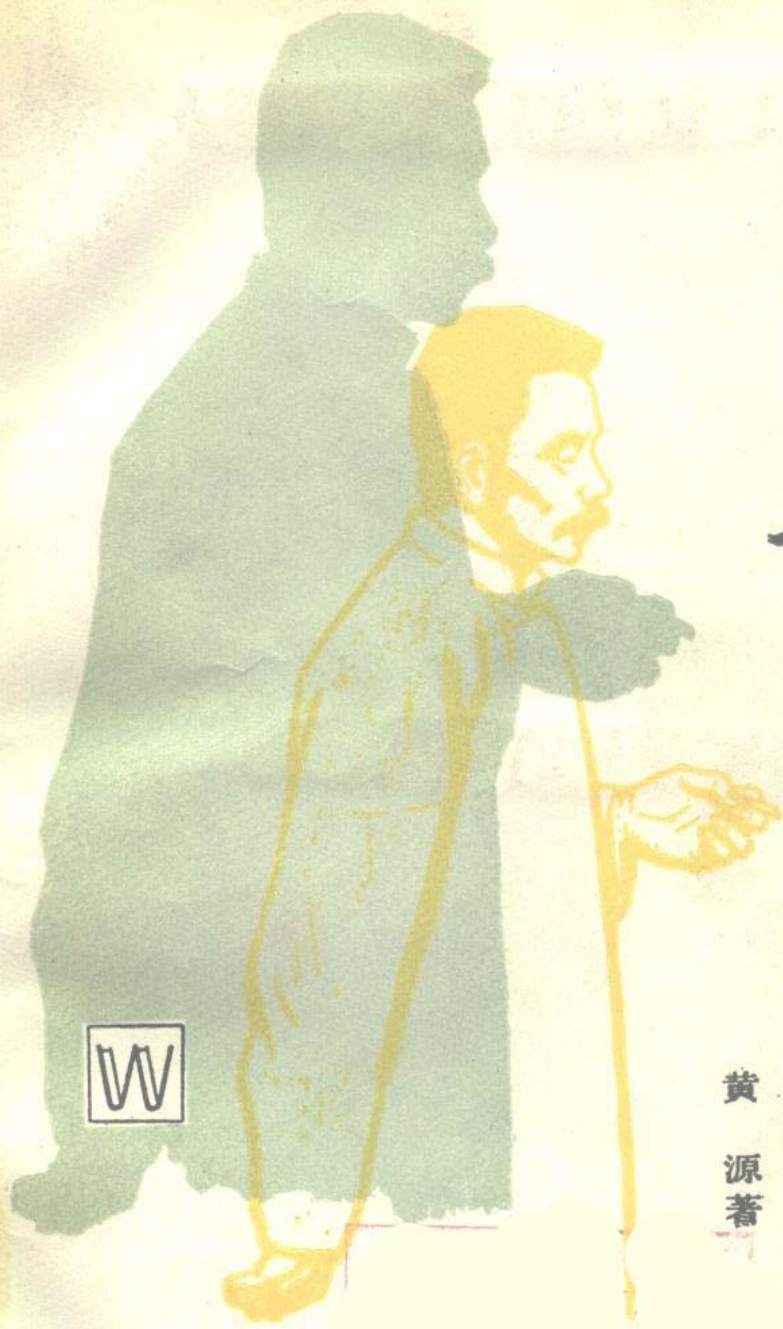


在鲁迅身边

黄源著



在鲁迅身边

ZAI LU XUN SHEN BIAN

黄 源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乐秀镛

在鲁迅身边

黄 源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57,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 7-5321-0751-5/I·598 定价：4.90元

序、言

这本小书里所选集的文章和讲话，都是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写的，共计五十七篇，以其内容和体裁的异同，分为五部分，大致都按写作的年月排列的。

第一部分，都是纪念鲁迅先生的，计二十一篇。因为其间1981年为鲁迅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1986年又是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首都和全国各地都举行隆重纪念，浙江省经党中央批准并举行了鲁迅铜像奠基和落成典礼，我应各地报章杂志的需要，写了这些短文。我的着眼点，是吸取鲁迅先生的一些宝贵经验，作为借鉴，供新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作参考。

第二部分，是纪念茅盾同志的，计八篇，我曾经在鲁迅、茅盾共同领导下工作过，有时我在鲁迅家里谈工作，有待作出决定时，鲁迅常说，你去请茅盾来，共同商量。那时茅盾同住在大陆新村。因此我纪念鲁迅时常同时想起茅盾。这里前面三篇，是共同纪念鲁迅、茅盾的，我就编在纪念茅盾同志的这部分。鲁迅诞辰百周年紀念日是1981年9月25日，不幸茅盾于同年4月7日逝世，未能主持鲁迅诞辰百周年纪念。我是在隆重的纪念和沉痛的悼念中，写下这些文字的。重实感而

缺乏全面的理性论述，是全书的缺点，也包括这部分文章。

第三部分，是纪念我敬佩的师长和先辈、同辈的文艺战线的战友的，计十三篇。近年来，我感到痛苦的一件事，是我同时代的许多师友，不断的相继逝世，在我心中留存着他们的有功于世的业绩，来不及写纪念文章，这些追念文字，都是为纪念会或纪念文集赶出来的。

第四部分，是历年来工作经验的点滴回顾，计七篇。凑巧反映了各个时期在各个地区工作的侧重点。三十年代在上海跟鲁迅、茅盾编辑《文学》、《译文》，是为反文化“围剿”服务的，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编辑《抗敌》、《新四军一日》，是为开展部队文学工作服务的，在苏北根据地继丘东平主持华中鲁艺，是为培养革命文艺干部服务的，此后转入浙东抗日根据地抓越剧的故乡的越剧改革，上海解放后重回上海，和上海文艺界同人共庆解放，继承和发扬革命文艺传统，回到故乡浙江用毛泽东思想救活了《十五贯》，都是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

各篇写作时并没有有意作此安排，只是应各方的需要，把留着较深印象的人事记述下来。现在可以实例说明，凡是在党的正确方向指引下，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就有起色，而坐在机关里空谈，则一无成就。我想这经验对于今天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同志也是适用的。

第五部分是给战友们写的序，计八篇。

最后，感谢老战友叶飞同志为拙著题字。

黄 源

1990.1.

目 录

序言	1
在鲁迅身边	1
谦虚是鲁迅的美德	16
鲁迅与木刻	19
鲁迅与《文学》	21
鲁迅对“捧”的严肃的态度	28
宋庆龄与鲁迅	34
鲁迅先生二三事	40
鲁迅精神体现在新四军的二三事	52
学习鲁迅 纪念鲁迅	66
鲁迅塑像奠基礼上的讲话	70
要重视学习和研究鲁迅的思想方法	72
努力开创鲁迅研究的新局面	80
对《世界文学》的祝愿	86

——纪念《译文》创刊五十周年

DQ27/66

释“从公意”89

——关于鲁迅写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前后

我的心愿94

学习鲁迅爱小老虎的精神97

纪念和祝愿101

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鲁迅106

鲁迅杂文题解六篇110

鲁迅和内山完造117

鲁迅的思想遗产为中日所共有125

谈鲁迅、茅盾怎样处理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

关系128

鲁迅和茅盾在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上的两次

合作133

走鲁迅和茅盾的道路143

沉痛悼念导师雁冰同志148

学习雁冰同志的宝贵经验和高贵品质153

悼念茅盾同志157

重新认识和研究伟大作家茅盾160

学习茅盾 研究茅盾164

悼念雪峰同志169

我的良师益友——雪峰同志174

深切悼念林淡秋同志178

在《蜃楼》描绘的葛岭追念前辈郁达夫	180
怀念郁达夫烈士	189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郁达夫	199
“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匡互生老师	205
忆念二十年代革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者杨贤江 同志	216
纪念夏师可尊	225
我所知道的胡风同志	235
跟随鲁迅在反文化“围剿”斗争中的聂绀弩	241
忆平羽	248
华中鲁艺战斗中的知友——蒋天佐	257
学习鲁迅,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前进	264
——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	
回忆编写《新四军一日》的前前后后	271
关于《东平之死》	281
回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越剧改革	292
回忆解放初期的上海文艺界	298
毛泽东思想救活了《十五贯》	302
为把昆剧艺术“传”下去而奋斗	308
《外国文学艺术家轶话》序	311
一部贯彻摩罗精神的译诗集	315
——孙用《译诗百篇》序	

不能忘却的记念——沙可夫	325
——《沙可夫译文集》序	
一个崇高的心灵	344
——《陆蠡文集》序	
《前方》序	351
学习茅盾的革命的成功之道	358
——《运河之子》序	
赵松庭的笛子	364
——《笛艺春秋》序言	
朱生豪实现了鲁迅的企望	370
——《朱生豪传》序	

在鲁迅身边^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黄源未尝作文捧我，也没有给我做过传”，这是在他逝世前两个月说的。他逝世后，我写过几篇纪念文章，是不是捧了呢？据鲁迅的意见，所谓捧，不过是称赞换了一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表面上虽像捧，实则上说得刚刚合适，是不能责备的。这样说，我确实称赞了的。至于说得是否刚刚合适，只能听读者的批评。我自己是觉得大大不够的。说实在的，我还没有作到根据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国情和它的变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用政治和艺术统一的标准，历史地、全面地、系统地、认真地研究过鲁迅一生的言行。他的著作、书信、日记，在近代的著名人物中恐怕是比较最齐全的，而且公之于世的未经旁人增删、润饰的手稿还在陆续印行，佚文也不断的发现，记述鲁迅的言行和研讨鲁迅的著作，也比较多，可以说在近代的伟人中研究鲁迅的条件，是比较好的，而我还没有认真地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写出刚刚合适的文字，更谈不到做传，是应当受到责备的。

今天讲的，也只是漫谈，很不周全的，唯一敢于坦率说的，

① 本文系1979年9月应中国作协黑龙江省分会邀请，在哈尔滨省、市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说的是真心话，是实感，供同志们参考。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我有幸在鲁迅先生身边工作，亲聆先生的教诲，已是先生的晚年。

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是在1927年10月。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鲁迅先生在广州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当时他在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眼见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惨遭捕杀，他竭力营救无效，愤而辞职。9月底离广州，10月初到上海，定居下来，开始了鲁迅先生战斗一生中最辉煌、最伟大的十年。

鲁迅先生一到上海，就投入战斗，连续被邀到许多大学里去演讲和讲课，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鲁迅先生在上海第一次公开演讲，是在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讲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那次讲话中，鲁迅先生根据我国大革命失败的情况，深刻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他们的动摇不定、脱离实际等弱点，告诫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接近平民”，要“为民众说话”，应当为社会的前进“做一点事”，为革命要珍惜生命，但是也要“预备着将来的牺牲”。徐缓的声调，风趣、朴实、幽默的语句，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和巨大的说服力。时而引起一阵笑声，而更多的是发人深思。鲁迅先生每次演讲都不长。这次讲了一个小时光景。他的演讲完了，但是他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荡。我努力按他的语气把记录整理出来。讲话原来没有题目，我按他讲的内容加了个题目。整理稿送给鲁迅先生，他在《日记》里记着11月3日“晚寄还劳动大学讲稿”。记得先生只增加了短短的一句话，首先就在《劳动周报》上发表。当时我和许天虹、钟子岩都

是劳动大学编译馆的助理员，我们三人一起作这记录，经我整理定稿，这记录稿之所以比较完整，是经过鲁迅先生审定的，同时是三人劳动的结果，因为工作有分工，发表时只署我个人名。不料34年后，竟有人著文说：这讲演记录，据他的记忆“有失原意之处不少”。鲁迅先生当年的这条日记，证明这讲稿是经审阅后寄还的，正好是对胡说者的答复。

四天之后，也就是10月28日，鲁迅先生又被邀去上海立达学园讲演。我又被邀去当记录。这次讲题是《伟大的化石》，鲁迅先生在讲演中，巧妙地揭露蒋介石对孙中山先生的背叛。讲演后我们一同在会客室吃茶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先生任意谈笑。这是第二次见面。在1931年，鲁迅先生将董秋斯夫妇译的《士敏土》交我编入《世界新名著译丛》，他为该书译了代序，并将木刻复制了插入本书。还亲自校阅了全书。

而我有机会经常直接接近鲁迅先生，出入于他的门下，在他身边聆听他的教诲，那是从帮着《文学》和《译文》两个杂志办一点事开始的。

《文学》是1933年办起来的。在1921年，文学研究会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先后在商务印书馆接手改革一个刊物，叫《小说月报》，它继承早期《新青年》的精神，主张为人生的艺术。但到1932年“一·二八”，闸北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被毁，战后其他的杂志逐渐复刊，而《小说月报》被压制始终不给复刊。这时郑振铎从北京来上海，他建议恢复《小说月报》，改名为《文学》，改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他的建议得到茅盾、胡愈之的支持，鲁迅和“左联”的赞助。茅盾是“左联”的主要领导成员。所以，《文学》是以文学研究会为基干，结合

“左联”和其他进步作家，是一个全国性的进步的大型文学月刊。出面是郑振铎、傅东华，实际上是以茅盾为主导，鲁迅积极支持。左翼作家和文艺批评家都给他写稿。巴金、郁达夫、沈从文、老舍、刘思慕等著名作家是经常撰稿者。那时是“一·二八”之后，主题是抗战，作者除了在政治上同国民党文化特务有关系的不要之外，都要，是很开门的。当然以推荐进步的作者为主。

1934年还办了一个《译文》。这个杂志是鲁迅先生主办，茅盾等竭力支持的。为什么要办《译文》呢？一个原因是，当时国民党采取检查制度，写东西比较困难，不能正面写文章，因此想法用翻译来揭露；再一个原因是，“注重翻译，以作借镜”。鲁迅先生是很注重“洋为中用”的。就在那次《关于知识分子》的演讲中，他就鼓励人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不要神经衰弱。他说，只要我们善于消化吸收，就是西方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如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当时我们很多年轻作家，不善于用文艺的手法来反映生活和革命，写的东西不生动。鲁迅先生想通过《译文》来介绍一些外国的杰作，作为借鉴。无产阶级的作家和资产阶级的作家，立场、观点不同，但是资产阶级的作家在运用文艺手法，如何把他所见的生活变成艺术，有长处，有可借鉴之处。这不仅在文学上，木刻上也是一样。当时搞木刻的都是左翼美术家，鲁迅也介绍外国的木刻。鲁迅先生有一个爱好，就是广为收集外国名家的木刻。《译文》是鲁迅先生一手办起来的。直到鲁迅先生临终前一天，他已无力说话了，但还念念不忘报上是不是已经登了《译文》目录的广告。1934年到1936年，鲁迅先生自己写文章发表的地方，一个是《文学》，一个是《译

文》，一个是《太白》，还有《自由谈》、《世界文库》等等。我当时是《文学》的编辑，以后由茅盾推荐，帮着鲁迅先生办《译文》，因此也就有机会经常接近鲁迅先生。我从1934年办《译文》，直到鲁迅先生逝世，参加他的葬礼，一直在先生身边。

我们知道，当时除日本侵略外，中国革命国内面临着两种反革命“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的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而鲁迅先生是这场文化革命中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1934年前后，也正是这两种反革命“围剿”最残酷的时候。我当时虽然在他身边，有机会看他待人处事，但是对鲁迅先生的理解是很浅薄的。直到抗日战争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参加了革命实践，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在华中局党校听过刘少奇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等四大报告，又经过整风学习，才加深了一些认识。

当时“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鲁迅先生率领的文化大军能取得文化反“围剿”的胜利？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成为被压迫人民的代言人。鲁迅先生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历史是很熟悉的，观察、剖析最深刻，这是我们许多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光复会、辛亥革命，他是亲身经历过的，是知道怎么失败的。从“五四”《新青年》时代开始，他一直和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当时他就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称他们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1926年以前他在北京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共同反对北洋军阀。他在广州时，广州是北伐的大后方，国共两方都拉他。国民党朱家骅等送请帖请他去赴宴，他断然拒绝，他完全站到共产党一边。以后他

又亲眼目睹了“四·一二”事件。他后来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认识到“唯无产阶级才有将来”，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同时他是从旧垒中来的，情况看得较为分明，因此他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是有深刻认识的。他同从实际出发的党的思想路线是息息相通的。他曾批评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李立三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曾邀请鲁迅发表一个宣言支持他的路线和主张。鲁迅先生当即拒绝了他的意见。1936年冯雪峰同志从瓦窑堡回到上海，向他传达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鲁迅先生坚决拥护并身体力行，同时公开声明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民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以表示他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敬和爱戴。

实际上，在文化反“围剿”的实践斗争中，早形成了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左联”的鲁迅、茅盾为主将，对付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书报检查制度，“左联”不能出面，依靠着统一战线，是从实际出发的。1930年，“左联”成立之后，中国革命文学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而敌人利用他们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加紧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先是抛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支持“第三种人”，接着捕杀柔石、逮捕丁玲、暗杀杨铨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作家，最后采取书报检查制度，查禁进步书刊，禁止进步人士发表文章。鲁迅先生和“左联”作家写作、编辑的文章、书刊是首当其冲的。鲁迅先生的一本《二心集》被删得只剩十六篇文章，书店改名为《拾零集》出版。鲁迅先生一篇《病

后杂谈》准备在《文学》4卷1期上发表，一共四节，被审查官删掉四分之三，只剩第一节。只剩一个“头”了，没法用了，我去报告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这种文学暗杀政策，深为震怒，要求将这“头”在第2期上发表，把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拉出来示众”。因此在发表时，文章第一节前面的“一”字原封未动，文章末尾，留了一段空白，下面并无二、三，把“头”空悬在那里，加以揭露。“左联”的刊物，在1933年之前就几乎禁绝了。冯雪峰同志编的《萌芽》1930年1月创刊。“左联”成立后，改为“左联”刊物，到第5期，即被查禁。第6期改名为《新地月刊》，仅出一期。《文学导报》1931年4月创刊，只出了8期，也被查禁。丁玲编的《北斗》1931年9月创刊，到第二年7月也被查禁。继《北斗》被禁之后，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出了6期，1932年12月也被迫停刊了。到1933年初，反动当局采取禁绝的办法，“左联”创办的公开刊物被禁绝了。文学斗争已没有阵地。这些杂志被查封之后，鲁迅投稿就困难了。怎么办呢？针对这些实际情况，他和茅盾等争取了《申报·自由谈》的地盘，打开新的局面。

《申报》是当时中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发行最广的一张报纸。最初是由英商创办的，辛亥革命后，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是史量才办的。《自由谈》原来的编辑是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九·一八”之后，史量才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抗战的要求，请留学法国，专攻文学的黎烈文来编《自由谈》。黎烈文主持《自由谈》之后，进行了革新，邀了许多知名人士、教授和左翼作家写稿，并托郁达夫转请鲁迅先生写稿。鲁迅先生从1933年1月24日到2月3日写了六篇稿子，由郁达夫转给黎烈文。从2月7日起就同黎烈文建立了直接的投稿

关系。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短论杂文，用不同的笔名，每篇千把字，每月八九篇，主要针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由于《申报》发行很广，所以影响很大，当时的读者，只要《申报》到手，先看副刊，副刊打开，先找“花边”。因为鲁迅先生的文章，编辑常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鲁迅先生在《自由谈》上只发表了六篇文章，国民党的文化特务头子就知道鲁迅先生化名在该刊发表文章。第二年5月，国民党终于迫令史量才撤去黎烈文《自由谈》编辑的职务。（史量才后来也被国民党蓝衣社暗杀了。）黎去职后，张梓生接替黎办《自由谈》，张和鲁迅先生也是老关系。鲁迅先生为张梓生写的那首《秋夜有感》的诗，是针对当时的文坛情况，对张接办《自由谈》的建议和希望。鲁迅先生继续化名在《自由谈》发表文章。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序言》中说，对他的稿子“新任者不能细辨”。这是为了迷惑国民党检查官，保护张梓生。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鲁迅先生后来集成《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几本杂文集，这是反文化“围剿”的光辉纪录。除了利用《自由谈》、《动向》这两个阵地之外，前面说过，他还在《文学》月刊、《译文》月刊、《太白》半月刊和《世界文库》以及《作家》、《中流》、《海燕》等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些刊物都是在鲁迅先生、茅盾先生和“左联”的主持和支持下创办起来的。因为这些刊物的出面编辑，敌人知道都不是共产党员和“左联”成员，就无法动用禁止、逮捕、杀戮等手段。而鲁迅先生和“左联”作家和译者的译著，都通过这些杂志，影响全国。直到1935年5月，因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反动当局的图书杂志的审查机关，被撤销关门。“左联”又办起了自己的刊物。所以，当时虽然在政治上敌人处于统治地位，而在文化战线上鲁迅先生、